

挖掘珠海历史名人文化精神 塑造城市认同感

赵凤莲^{1,2}

【摘要】珠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三类历史名人：留学教育的先驱，大买办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同时亦产生了三类历史名人文化，即留学文化、买办文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文化。其中，留学文化塑造了珠海人的城市归属感；买办文化塑造了珠海人开放进取和自强自立精神；社会主义运动文化塑造了珠海人的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珠海名人文化 认同感 归属感 使命感

城市文化品位和公众文明素质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精神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珠海的科学发展既要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有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特别是还要有人与人的历史文化和谐。珠海市委在《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着重指出：通过发掘、整理、宣传珠海近代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珠海留学文化、商业买办文化、社会主义先驱文化、特区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一、挖掘珠海历史名人文化精神

珠海，是珠江口西岸的一个边陲小镇，人口只有几千人，但是近代以来却产生了五十多位历史名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通过考察，珠海历史文化名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珠海出留学教育的先驱。

容闳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回国后立即投入报效祖国的活动。他出色的办过洋务，向太平天国领袖游说过复兴中国之道。后来又终于完成了他的宿愿，使 120 名留美幼童成行。这些幼童，珠海籍的就占四分之一，他们虽然提前回国，但是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突出贡献，有不少人为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珠海还出产大买办商人。

归中国洋行的大买办几乎全部产自香山珠海。珠海人唐廷枢就曾经是英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也曾经担任英国另一家大洋行宝顺洋行的大买办；英国另一个大洋行的总买办是莫仕扬家族祖孙三代，莫家在太古洋行垄断总买办达 60 余年。当时洋行内流传“只有有莫（家），不知有英（国）”的传说。莫家是珠海金鼎会同村人。总之，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香港的英国最大几家洋行的大买办都是珠海人。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当时已成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却无人攀到总买办的位置。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第三，珠海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

到了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兴起。在北方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而在南方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珠海人杨匏安。当时曾有“南杨北李”之誉。珠海人苏兆征、林伟民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中又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袖。后来苏兆征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珠海人在不同时代都走在时代最前列，总能为天下先。珠海怎么了？就是几个小小的渔村，每当时代潮流需要向前跨越一步的时候，它总能涌现出引领全国潮流的顶尖人物。原因何在呢？这就是我们要挖掘的珠海历史文化精神。

考察起来，珠海人至少有几个基本特质：

第一，珠海人能吃苦，勇于开拓进取。

起初，北方逃难来的难民和南宋海战的散兵在珠海所在的荒岛上生活。珠海的土地是沙田，长不好庄稼，百姓不足以生存，只能过着半农半渔的生活。珠海人要向大海讨生活，他们每天要出海，战台风，战大海，每次出海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归来。珠海人特别能吃苦和勇敢开拓的精神就是在这种半耕半渔的劳作方式中养成的。

第二，珠海人诚实、谦逊、有同情心。

珠海人都是逃荒来的穷人，他们所接受的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不是从儒家的典籍中，而大多是从中华传统生活习俗礼俗中传承的。珠海穷人没有士大夫家庭那么多的等级观念和礼教观念。他们从生活习俗中接受的是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诚实待人、同情穷人等优秀品德。小康家庭的天伦之乐和平民的地位孕育出珠海人朴素的民主主义意识。珠海人精神包袱轻，更容易轻装前进。

第三，思想开放，懂得市场经济。

珠海人具有先进文化底蕴的一个最大有利条件是紧邻澳门。澳门让葡萄牙人居留早于香港三百年。珠海人在给葡萄牙人或其他西方人供应蔬菜、肉类、鲜花和劳务，同时也进行货物的买卖。在这长达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珠海人懂得了西方市场经济和买卖规矩，同时又保有中华商业文化的诚信品德。在那个时代，珠海人脑子里都有“澳门观念”，一位老人（唐绍仪的侄孙）讲到：“当时，只要珠海人无法生存时就到澳门讨生活”。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容闳的父亲就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澳门学洋文学洋务，以图将来能谋得一洋差事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是一个珠海农名的开放眼光。这对由黄河文化哺育出来的北方农民来讲，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就是珠海产生诸多历史名人的重要原因。

二、城市认同感的理解

所谓“认同”，其实就是对同一性和归属感的追求。从词源上讲，“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 *idem*。英文中的 *Identity* 经常被译成“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仅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更重要的是个体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而且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就落脚到一种归属问题。

所谓归属，其实就是一个辨别过程，是指一个事物经由辨别自己与其它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在这种辨识的过程中，个体既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会发现自己与群体之物的相似点，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一种确认。因此，“认同”就是对于“我是谁？”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一个不断自我诘问过程。

对一个城市的认同，也是生活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不断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一种身份的确证，一种归属感的获得。现代社会的

流动性和碎片化很难使人具有一种连续的感觉，认同的对象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中，而认同的主体又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我究竟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又将去往何方？在不断地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确证我是否属于这个城市，我对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情感寄托，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

其实，城市认同感就是生活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对这个城市是否具有归属感、情感和价值感的不断追寻和不断确证。塑造城市认同感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因素是塑造城市认同感最稳定、最持久的因素。

三、珠海历史名人文化精神对城市认同感的塑造

珠海是一个有着先进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仅就历史名人而言，近代珠海就产生了五十多位历史名人。珠海产生的历史名人以三类人最为突出，即留学教育的先驱，大买办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这些历史名人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文化精神是塑造城市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一）留学教育先驱对珠海人归属感的塑造

容闳有很深的爱国爱家情结，这从他一生的行动——留学、经商、洋务、兴学、改良、革命的活动都有表现。

容闳，1828年11月17日生在珠海南屏村。1840年11月入马礼逊学校。6年以后，马礼逊学校教师要回国，决定把班中最好的学生带走，他们是容闳、黄宽和黄胜。后来，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直到25岁才回来，在洋人教育下度过18年。

一个7岁的孩子就进了教会学校，容闳可以说是西方教育下长大的青年。当两者舍一求一的时候，他拒绝了在美国的优厚生活，毅然地选择了祖国。他对祖国的如此深爱，原因是什么呢？他的爱国情结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容闳曾写给美国友人S·W·威廉先生一封信，信中容闳除慰问旅途疲劳之外，还请威廉帮忙。一是希望威廉雇用自己的哥哥，意在借此稍减家中经济困难；二是请威廉到自己家中看看，向母亲和姐姐说明延期回国的理由。因为原来计划两三年内学成归国的。又请威廉向叔叔做较详细的解释，说明整个学习要六年时间，希望叔叔能协助说服母亲。容闳也坦率地告诉威廉，家人担心他信奉基督教并且不再回国，渴望他尽快回来赚钱养家。

从这封信我们看到了容闳永久的爱国情结的深层原因了。他眷恋的祖国，是放不下心来的母亲、姐姐和哥哥，时刻惦念的是自己这个贫穷的家。他的家太穷了，过着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容闳如果有可能学三年而不是六年，那他会一天不停息的急奔家乡，赚钱奉养母亲。

牵动容闳心灵的，只有珠海的家，一个贫穷而不稳定的家。海外学子烦恼的事可以说是一个连着一个，但是没有什么事比思虑起贫困的家使他更烦恼了。哥哥的去世，家中的顶梁柱塌了，今后母亲姐姐如何生活？容闳整整悲痛两周，而且后悔自己“早就该返回家园”。

珠海的家，永远是容闳魂牵梦萦的地方，当一个人把一个城市当家的时候，他的归属感就油然而生了。

（二）买办大商人对珠海人开放进取和自强自立精神的塑造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中国，它的主要据点就是洋行。

广东香山人（珠海）在鸦片战争以后被看做是买办的同一语。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买办几乎全部出自珠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珠海人唐廷枢是英国老牌大洋行

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是英国老牌大洋行宝顺洋行的总买办；再一个是莫仕扬，是英国大洋行太古洋行的大买办。这三个英国老牌大洋行的总买办，没有一个出自广州，没有一个出自香港，也没有一个来自上海，而全部来自珠海，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买办是洋行的雇员，拿固定工资，另外，每做成买卖，还要从中抽取佣金，这属中间人、掮客的性质。买办身份的变化是向洋行参股，外商企业的势力要通过买办深入到流通领域；同时外商的轮船、仓栈码头、保险、船舶修造和银行又都注入了买办资本。买办靠洋人赚钱，靠洋人在华特权赚钱。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之路。

例如，唐廷枢参股于外国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等。这种借鸡生蛋的参股行为属于洋、商合办性质。这个时候的洋行同中国商人已经成为一种合作关系，买办一词也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买办活动仅限同洋行的这层关系，更大程度上他们是进出口商人。对于唐廷枢来说，告别10年的买办生涯入主轮船招商局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成了洋务运动的官员并且向民族资本转化。唐廷枢最早买船投入航运的原因，郑观应有过一段回忆：

“观应前闻唐君景星（即唐廷枢——注）云，伊昔年由沪返港，其船避风，船主限每客水一铁壳，约重一磅，日中解渴洗面均在内。唯船中有羊百余头，则满桶水任其饮，待人不如羊，殊为可恨。于是在港集股银十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①外国轮船的种族歧视激起唐廷枢的义愤，此后他积极倡导租船往来于沪港粤，这是他执意丢掉总买办而投入中国人自己的轮船招商局的重要原因。入局不久，他与轮船招商局帮办，他的老朋友徐润共同拟定的“预算节略”中道出了他们办招商局的宗旨：“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唯盼各帮联络，共襄大局，使各转运之利尽归中土，岂不美哉！”^②唐廷枢，徐润在这里的“以收利权”，“航运之利尽归中土”的兴奋心情暴露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两个大买办长期受制于洋人被压抑至久的收回利权的情怀。唐廷枢与李鸿章的合作标志着唐廷枢从此不再代表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利益，自进入招商局以后，唐廷枢后来又办过开平煤矿，在创办工矿企业方面他也是佼佼者。

珠海的这些从凭借帝国主义特权发财的大买办到同洋人在航运业、采矿业中生死搏斗的爱国企业家，自立自强、开放进取的优秀文化价值取向在他们身上得到深刻的认同。香山珠海作为买办的摇篮，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管理方式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见证了珠海这座城市在时代发展中的价值，鞭策着珠海人继续探索时代发展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对珠海人使命感的塑造

到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兴起。当时中国最早出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又是珠海人杨匏安，在北方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当时曾有“南杨北李”之誉。当工人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候，珠海人苏兆征、林伟民又成为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袖。后来苏兆征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杨匏安，香山南屏人，因为不满于国内的黑暗势力，被迫东渡日本。在日本，靠卖文生活，这期间从日本的翻译著作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也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

文章,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国共合作。同样是东渡日本,很多留日学生走的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学革命之路,而深受珠海历史文化影响的杨匏安却能更直接地选择了政治革命的道路,并且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苏兆征,广东香山淇澳岛人,18岁的苏兆征为了谋生,赴香港在一外轮当杂役。在成千上万的香港海员中,一个杂役出生的苏兆征能够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袖(珠海人林伟民也是如此),其原因不能不追溯到珠海人的吃苦精神和开放精神。他勇于也善于吸收先进思想,在他接触到俄国革命之后,就勇敢执着地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珠海这些社会主义运动先驱的一生业绩所体现出来的对时代使命的探求精神,是珠海的宝贵文化资源,也展示了珠海这座城市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对历史使命的担当。

以上对珠海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还仅仅是我们初步研究成果。我们必须坚持研究珠海历史文化精神,为珠海今后的改革开放事业寻找深厚的先进文化底蕴,让改革开放事业更扎实、更理性、更自觉地发展下去。

注释:

①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28.

②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运篇[M].1935:147.

参考文献:

[1][苏]伊·谢·科恩.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M].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2]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M].上海:上海黎明书店,1932.

[3]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运篇[M].1935.

[5]容闳.容闳自传[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6]李恩富.我的中国童年[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7]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A].

吴文莱.容闳与中国近代化[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8][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9]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1.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资助项目《珠海历史文化与珠海人现代化研究》(项目批准号:GD14DL10)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凤莲(1982-),女,湖北荆州人,中山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地方历史文化、管理哲学。

(上接第23页)

较低的制作成本和极高的参与度,导致传统剪纸文化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追捧。剪纸本身具有十分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其中包含着人们的生活智慧和艺术理念,这也导致剪纸元素早已成为了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6]。因此现代视觉传达设计者可以从剪纸等传统文化符号中,寻找创新的灵感,将二者进行有效的融合,以此来提升作品的表现力。比如在对陕西传统美食的产品包装进行设计过程时,就可以有效融合当地的传统剪纸元素,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推广陕西传统美食,还能够更好的推广陕西传统文化,真正显现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

三、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视觉传达领域还仍然在摸索着自己的道路,只有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有效融合传统文化符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黎君.敦煌联珠纹的形态特征与其在视觉传达设计中

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5,36(10):104~107.

[2]高懿君.以甘肃为例试分析地域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J].中国包装,2016,36(11):47~50.

[3]张媛,张珂.传统茶文化符号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研究[J].福建茶叶,2017,39(08):97~98.

[4]万煦.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茶叶包装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J].福建茶叶,2017,39(10):117.

[5]张舒胤.中国传统美术色彩对现代平面设计视觉传达效果的影响[J].大众文艺,2016(13):138.

[6]胡强,杨慧.论汉字符号在标志设计中的建构——以盘龙城遗址博物馆标志设计为例[J].创意设计源,2016(05):16~21.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作者简介:刘步天(1986-),男,硕士研究生,齐齐哈尔工程学院视觉传达教研室,副主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